



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标准下降,某种程度上是牺牲消费者利益向乳品产业环境妥协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谁绑架了乳品新国标?

来自江苏的核心专家揭秘乳品新国标制定过程
大企业起草初稿,但并未参与最关键的国标审评
两大关键标准降低,获益者其实是中小企业和奶农

国标争议再起

快报由此展开的采访则发现,大企确实参与了标准起草工作,但并未参与最关键的标准审评环节,此外,多家企巨头也表示,他们执行的企业标准,其实已经高于新国标的最低限值。标准降低,真正保护的,其实是生产水平偏低的中小企和奶农。

“大企业绑架说”愈演愈烈的背后,更多是消费者对中国乳业行业远未消除的信任危机。其实更令人费解的是,新国标相比1986年老国标在生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上的标准降低。按理说,随着产业和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乳标准应该提高而非降低,不提反降的背后,是我国目前仍然粗放和低水平发展的乳业环境,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真正绑架了新国标的,是中国乳制品整体的产业环境,而非几家企巨头。问题是,国家标准怎能向产业环境低头?

□快报记者 刘峻 郑春平

No.1 第一个问题—— 大企业绑架了新国标?

专家质疑: 企业起草初稿不妥

对乳制品新国标一直持质疑态度的专家还有两位,79岁的魏荣禄,任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80岁的曾寿瀛,任中国乳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但按照卫生部的说法,在乳品标准起草审定工作中,上述两位既不是70多岁的专家组成员,也不是300多人的审评委员会成员,但他们受邀参与了这项标准的制定。

但他却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说自己不想出名或卷入纷争,只是看到近来关于乳制品新国标的争议日盛一日,觉得一定要和快报记者说说自己的观点,“说标准被大企业绑架,我个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此前,相较于江苏这位专家的低调,被称作乳业大炮的广州市乳业协会会长王丁棉高调提出,现行乳标准是“史上最低”,并称这个标准是遭到大企业利益挟持的结果。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乳制品新国标的批评也毫不留情,纷纷用“全世界最差”“一夜倒退25年”等字眼加以猛烈炮轰。

卫生部网站则刊发卫生部和农业部两位专家的文章,对此进行了答疑,认为不存在企业绑架新国标的事情。但各界的质疑声仍未平息,降低标准被指是“最省事”的做法。既可以名正言顺说保护奶农利益,又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最终损害的,却是消费者的利益。

到11月底《人民日报》的报道出来后,争议进一步升级。专家再度质疑,认为这是“关键标准遭遇最后一刻翻盘”,此举难避暗箱操作之嫌。现在看来,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参与到底制修订过程中,“大企业绑架了新国标”;二是关键指标降低,新国标是倒退;三是新国标“几乎全世界最差”。

乳企喊冤: 初稿比最终标准高

为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快报记者对两份名单进行了求证。一份是

卫生部提供的“乳品质量安全标准工作组专家组成员名单”,记者看到,其中包括了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3人,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16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学者5人,三元、蒙牛、伊利、光明、雅培、美赞臣、达能、湖南亚华等乳品企业代表9人。据悉,参与了标准起草的专家有70多位。

第二份是在后期的审评中,卫生部网站上也公布了一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记者看到,具体名单包括10个专业委员会的350名委员,以及农业、商务等20个单位委员,其中没有企业界人士。

“我们确实只参与了之前的起草工作。”伊利公司负责公共事务的人士向快报记者表示,在乳制品国标修订之初,卫生部曾要求几家大的乳制品企业拿出一个初稿,提文讨论和审核。“其实我们拿出来的初稿,很多指标都比现在的要高,尤其是蛋白质含量。”

至于后来传闻中最后出台的标准“一夜翻盘”,正是因为被大企业绑架一说,伊利公司在给快报记者的书面回复中称,除伊利、蒙牛外,光明、圣元、完达山等国内知名企业在参与不同标准(至少10个标准)的起草。但需要明确的是,企业负责起草的只是最初的讨论稿,讨论稿需要提交给专家组进行多轮的技术探讨,最终提交给国家相关部委的审定稿代表了来自协会、专家等各方的意见,不代表企业的单方意志,不存在大企业绑架和左右标准制定的事情。

“企业并不参与后期的决议会,”伊利表示,企业没有权限也没有能力操纵国家标准的出台。参与初稿起草的另两家乳品

大企业,一是蒙牛,在争议发端之初同样“喊冤”:我们拿出来的只是类似的范本而已,企业是做不了主的。而光明乳业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光明并没有参与生乳标准的制定,参与的是酸奶标准制定,而酸奶标准没有降低。

两份名单: 最终审评不见企业代表

作为初稿的草拟方,企业在前期为什么可列入专家组成员,而后期的审评又为何被排除在外?从起草的专家组成员,到后期的审评委员会,人员构成是如何确定的?

对此,受访的这位江苏省营养学会专家表示,将企业纳入专家组是国际惯例,企业毕竟熟悉市场动态。而且标准的制定必须有尽可能的广泛性,生产企业作为乳品安全的重要一环,理应被纳入其中。“但绝不是说企业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只提意见和看法,有时还提供一些国外的参考资料。当然,在讨论的时候,他们也会根据企业自己的利益发言,这也是允许的,但不可能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据悉,标准最终确定需要经历两个步骤:首先,食品安全审评委员会分委员会进行评审,主要集中在专业领域,如污染物、添加剂、检验等环节。在分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标准提交食品安全审评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至于后期的审评除了企业代表,据称有章可循。“最关键的阶段应该是审评环节,而在审评以及以后的各个环节,绝对没有企业参与,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审评委员会秘书处王君副研究员说。12月1日,卫生部也回应,绝不存在企业绑架标准的事情。



No.2 第二个问题—— 两项关键指标为何降低

生乳蛋白质含量:由1986年老国标中的“每百克不低于2.95克”降到新国标中的“每百克不低于2.8克”
生乳菌落总数:由1986年老国标中“每克不得超过50万个”放宽到“每克不得超过200万个”

质疑汹涌:

是不是国标向乳企妥协?

争议里,两个数据的下调是引发争议的重要导火索,一个是营养方面的指标,一个是卫生方面的指标。我国生乳蛋白质量由每100克不低于2.95克降到2.8克,第二个则是每克生乳菌落总数由不超过50万个放宽到200万个。对于这样的“下降”,不少公众认为,标准应该提高门槛,这样才能维护人们的健康。

对于标准制定的江苏省营养学

会专家说,“其实在征求意见稿里,

当时有部分时段实施不同蛋白质标准的想法,但由于实际操作难度太大,最后没有通过。当然,在讨论里,也有委员提出应该降低蛋白质标准,但我国如果实施了高标准,夏天有一半的奶达不到要求要被倒掉。”

对此,卫生部也作出了回应称,

设置蛋白质指标大于等于2.80克

/100克。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考虑:

一是符合我国生乳生产实际。生鲜牛乳的蛋白质含量与饲养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尤其是全株玉米青贮饲料、苜蓿干草等优质饲草饲喂量对生乳蛋白质量影响很大。我国目前奶牛饲养中粗饲料结构单一、优质饲草饲喂量低,因此生乳蛋白质量也相对较低。

二是符合牛乳泌乳规律。在奶牛不同泌乳期蛋白质量不同,高峰期蛋白质量比中后期低。我国绝大部分奶牛在5~9月份进入泌乳高峰期,这个季节又是天气最炎热的季节,两个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夏生乳蛋白质量明显低于其他季节。

三是尊重客观事实。从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蛋白质量低于2.95克/100克的常乳,是客观存在的。

据农业部调查,2007年和2008年夏季,北方一些省份生乳蛋白质量低于2.95克/100克的比例分别达75%和90%;某乳品企业6月份西北、中南、东北等三个区购生乳蛋白质量低于2.95克/100克的比例分别达75.8%、33.8%和24.9%。

四是有利于生乳质量安全监

管。从调查情况看,荷斯坦牛奶蛋白质量主要分布在2.8~3.4克/100克之间,生乳标准作为质量安

全监管的依据,便于质量安全监管的顺利实施。菌落总数是反映奶牛健康状况、牧场卫生状况和冷链质量控制的卫生指标。目前我国奶牛小规模散养比例较高,1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例仅为23.1%,5头以下比例为32.4%,这种小规模养殖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养殖水平低造成生乳菌落总数相对较高。

中看到,需要质检机构才能判定。

为了照顾奶农利益,将生乳的

蛋白质指标、菌落指标下调,是不

是会影响公众健康?

对于这个质疑,参与标准制定的江苏省营养学会专家告诉记者,在整个事件中,有个概念首先要搞清楚,引起巨大争议的标准下调,正是指的生乳而不是成品乳制品。所谓生乳,是从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无任何成分改变的常乳,说白了就是牛生产的奶,并不是直接饮用的。而我们日常生活里喝的奶,则是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各类乳制品,而这些方面的蛋白质标准是没有下调的。例如《巴氏杀菌乳》《灭菌乳》等标准中规定蛋白质含量都不得低于2.9克/100克。

专家提示:

只是生乳降,成品乳未降

上述两项指标中,生乳的蛋白质量指标主要与乳品企业收购奶源有关,乳制品成品的蛋白质量指标公众可以从产品标注中看到。在南京各大超市,多个品牌乳制品的蛋白质量指标基本都高于每100克2.9克,通常为3.0克,一些主打营养牌的品种,蛋白质量甚至达3.3克以上。而另一项菌落指标,则无法从标注

■质疑者说



王丁棉:
标准史上最差

(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

王丁棉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乳品新国标“史上最差”。王丁棉还说,新国标从去年6月份执行至今,乳品销售没有明显好转,消费者信心依旧没有恢复,过低的标准只会“养懒人”。

王丁棉说,按照1985年的乳制品国标,我国牛奶标准是每克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而蛋白质量则最低每百克2.95克。去年颁布的新国标则变为:每克菌落总数提高到200万个,蛋白质量最低含量从原来的每百克不低于2.95克下调至2.8克。王丁棉屡次炮轰这些关键指标的降低,称这是最差标准。

王丁棉还介绍,在国际上,包括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细菌总数量标准为每克20万个,蛋白质量最低含量则为3.0%。



郭本恒:
标准世界最差

(光明乳业总裁)

2011年7月3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经营论坛上,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表示,中国生乳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标准不可能生产出一个非常高级的产品,“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对此言论,其他乳业巨头称不予评价。

No.3 第三个问题—— 差的奶源能做出好奶吗?

已遭指责:

乳品标准被指世界最差

新标准公布之后,出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乳品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的。持这一观点的,一是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二是素有“中国乳业第一炮”之称的乳业专家王丁棉,郭本恒甚至略带情绪地

说,“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

参与标准制定的江苏省营养学

会专家举例,生乳标准为什么

下调,卫生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而其他乳制品,其标准并不是什么

全球最差。

参与标准制定的江苏省营养学

会专家举例,生乳标准为什么

下调,卫生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而其他乳制品,其标准并不是什么

全球最差。

然而,质疑的声音丝毫没有减弱。最早对标准降低予以炮轰的王丁棉直言:“奶源质量差,不可能做出好的奶制品。”

王丁棉说,蛋白质量由原标准

中的2.95克,下降到了2.8克,在他看来不是“差不多”,而是远低于发达国家3.0克以上的标准。而每克生乳中的菌落总数标准却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奶源质量差,不可能做出好的奶制品。

他认为,灭菌处理后,“有耐高

温的菌,以及细菌产生的毒素、代谢物甚至细菌尸体本身,并不会被加热破坏、消灭,并且会保持活性。在牛奶这样本身富含营养的条件下,碰上适当的温度、温度和氧气,甚至可以出现微生物,比如虫、霉变等。”另一方面,细菌含量超标,需要更高的灭菌温度和更长的灭菌时间,这些会造成生乳中的热敏感物质如维生素的破坏。因此,对于婴幼儿配方奶粉,通常在灭菌后添加维生素等热敏感成分来保证奶粉中营养成分符合配方奶的标准。

同样关注乳制品标准之争的舟子也对菌落指标的调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新国标主要的退步在于取消了对致病菌的规定,“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隐患”。

记者手记 新国标向产业环境妥协,令人很失望

这场乳品新国标的风波,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一次“绑架”。然而,质监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快报记者表示,大企业参与产品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早就是国际通行的行为,不但国内这样,国外更是如此,“你总不能指望一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把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标准列得清清楚楚。”

俗话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企业制定标准,也就意味着有了行业内的绝对话语权。”该专家称,在各行各业的标书中,都有企业的参与,这很奇怪。尤其在一些国际通行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各国的政府部门都会鼓励本国企业想方设法“打入”标准起草行列。但是,为何这次的乳品标准却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该专家笑了笑,“那是因为参与

标准起草的大企业蒙牛和伊利等,都是三聚氰胺事件的责任赔偿企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对快报记者表示,大企业参与产品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早就是国际通行的行为,不但国内这样,国外更是如此,“你总不能指望一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把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标准列得清清楚楚。”

至于“绑架说”是否成立。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不同的观点。参与标准制定的江苏省营养学会专家认为,就企业绑架标准是“说反了”,“参与的大企业不是希望将标准放低,相反,他们是希望标准提高。门槛越高,中小企业就越难过,那么大企业就能越来越垄断市场,最后形成少几个牌子的乳制品公司来竞争,他们当然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这一观点,同样也是几家乳品大企业所坚持的,他们表示,目前自己公司所采用和遵守的标准,均高于最终确定的国家标准。

而质监部门的专家则没有直接回答,他认为,与其说标准被大企业绑架,还不如说是被整个乳制品行业绑架。因为,现阶段,中国乳制品行业规模化养殖程度远远不及发达国家,如果门槛过高,对众多中小规模的奶农而言就一个字:死。而这也恰如卫生部所言,《生乳》国家标准设置菌落总数的指标是符合我国发展实际,能够保护大量中小规模奶农的利益,维护我国奶业稳定发展。这其实也就是说,新国标之所以在生乳的两项关键指标上出现倒退,是因为目前的产业环境已经达不到1986年老国标设定的现值,所以为了避免乳品产业因标准过高而受到严重打击,只能下调标准来适应产业现状。

但这样的妥协,显然是令人失望的——在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食品安全标准层面上不穷

的